

·体育人文社会学·

#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构建及治理研究

蔡捷<sup>1</sup>, 尹瑞卿<sup>1</sup>, 孙晋海<sup>2</sup>

(1.山东财经大学 体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2; 2.山东大学 体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61)

**摘 要:** 全球体育是一个与全球治理紧密耦合的复杂社会生态系统。当前, 全球体育治理面临格局失衡、机制僵化、效能不彰与秩序失序等多重现实困境, 其根源在于以西方中心主义和命令控制为特征的传统治理范式已然失效。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 提出应将全球体育视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 并致力于构建一个以“共生共赢”为引导理念、以“多元主体-互动规则-资源流动-支持环境”四位一体为系统结构、以“协同-数据驱动-适应性学习”为运行机制的全球体育生态系统。通过理念重塑、结构重组、过程重构与制度调适的中国路径, 以期破解全球体育治理困境、推动全球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体育; 生态系统; 体育治理; 中国路径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6)03-0033-10

##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for global sports ecosyste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AI Jie<sup>1</sup>, YIN Ruiqing<sup>1</sup>, SUN Jinhai<sup>2</sup>

(1.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02, 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61, China)

**Abstract:** Global sports is a complex social ecosystem and also closely coupled with global governance. Currently, global sports governance is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actual predicaments such as an unbalanced pattern, rigid mechanisms, poor effectiveness and disorderly order, an the root caus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paradigm characterized by Western centrism and command and control has become ineffective now.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global sports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and endeavors to construct a global sports ecosystem with the concept of "coexistence and win-win"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a four-in-one system structure of "multiple subjects - interaction rules - resource flow - supporting environment", and a running mechanism of "coordination - data-driven - adaptive learning". On this basis, the research further puts forward Chinese pathways including concept reshaping, structure reorganization, process re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 aim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present predicament of global sports governance an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lobal sports.

**Keywords:**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lobal sports; ecosystem; sports governance; China's pathways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体育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身体教育和社会文化活动, 与治理存在着紧密的耦合性, 全球体育治

理既是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载体之一, 也是推进全球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力量。在世界进入新动荡变革期的背景下, 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的现代信息技术已全面融入, 我们迎来一个高度智能化社会的同时,

收稿日期: 2025-10-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336)。

作者简介: 蔡捷(1987-), 女, 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管理。E-mail: 314765618@qq.com

也步入了一个充满高度复杂性、多元化和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其中所蕴藏的矛盾已不再是传统社会中的“纯粹问题”。

按照《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积极构建体育外交新格局,扩大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在全球体育治理中的话语权,争取到2050年实现中国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位居世界前列”<sup>[1]</sup>,进行全球体育治理,提出中国方案已经迫在眉睫。现阶段中国参与全球体育治理体系建设成果显著,中国体育界近20人在国际体育组织担任重要职务<sup>[2]</sup>,但从体育外交、体育话语权、国际体育影响力、国际形象和国际贡献度等方面,仍需凝聚更多的中国治理经验。为此,需要思考新时代背景下如何优化全球体育治理的构思与路径,以便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体育中的话语权,彰显自身独特价值。

从治理视角审视全球体育系统,可知其是一个众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社会系统,涉及国际体育组织、政府、跨国公司、媒体、社会组织和专家学者等众多内部要素及变量,且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生成性的层级结构、适应性的演化机制和协同性的进化过程,这正符合奥斯特罗姆<sup>[3]</sup>定义的社会生态系统特征。对这样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治理问题,根据霍兰<sup>[4]</sup>建构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模型,自然需要基于系统整体的理论视角,围绕全球体育系统进行研究。这也为我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体育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于此,立足于如何抓住当前全球体育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全球体育实现稳态秩序结构,本研究着眼于全球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以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为根本任务,尝试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洞察全球体育治理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力图从不同层面厘清其治理思路,以期架构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治理的中国路径,探寻全球体育治理新模式,促进全球体育生态系统健康可持续发展。

## 1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构建的理论溯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随着时代的发展,体育生态思想中有关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为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构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构建及治理的中国智慧进行理论溯源,既传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也丰富拓展全球体育生态系统的理论内涵。

### 1.1 “齐物”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起源

春秋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先哲就产生了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的觉醒,《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对“大同世界”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这不仅言明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对全球体育治理中打破隔阂、友好协商原则的先见之明。万事万物休戚与共,老子和庄子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和谐共生的追求。老子的“观其同,则万物齐也”揭示了万物本质上的平等与和谐,强调从整体来看待世界的重要性。体育作为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其发展和治理需要各国之间的紧密合作与相互理解,意味着应超越国界、种族、文化的差异,以全球视野来审视和解决问题。庄子的“齐物论”进一步阐述了超越是非对立、达到和谐共生的可能性,“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站在个人的立场看问题难免会产生矛盾与偏颇,只有超越是非对立,不执着于个人的观点与得失,方能达到“和之以是非而体乎天钧”的境界。

在大国间竞争加剧的当下,“齐物”思想为全球体育治理注入一种“去中心化”“求同存异”的哲学视角。这种植根于文化本源思维模式,在应对制度文化兼容性、价值传播渗透性等问题时具有独特优势。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这种东方智慧或能帮助国际社会超越零和博弈,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体育治理新范式,让各体育参与的主体都被赋予相当的话语权,使体育真正成为一种超越人种、国籍、意识形态的国际通用语言。正如庄子所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体育作为人类共通的语言,终须回归其连接世界的本质使命。

### 1.2 “天人合一”:全球体育生态系统的思想发轫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sup>[5]</sup>。远在先秦时代,以儒家、道家思想为代表,形成了“法自然”的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蕴含了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个人内外和谐统一两个方面。在其基础上中国古代传统的体育观也逐渐形成,该观点主要强调“养气”“养浩然之气”,通过养气达到个人生理和心理的阴阳平衡,从而保持身体健康。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认为元气是生命的基础,元气在人体内运行并与外界不断交换物质与能量;元气分为阴、阳二气,其中阳气来源于天地自然,二气交合生成成人以及世间万物,因此人与自然具有共同本源,也有共同属性,表现为结构相似和相互影响,这就是“天人感应”。长沙马王堆出土

的《导引图》展现了中国古代的导引术,通过模仿动物形体动作,将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sup>[6]</sup>,发挥体育项目的保健作用,同时还强调练习时要量力而行、依时而行,这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说明中国古代体育与当代体育生态意识具有内在契合性。

尽管《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提出促进可持续的奥运会,2030 年之前实现气候友好型奥运会,但奥运会主要赞助商中化石能源企业占比仍达 23%;新建场馆“绿色认证”制度亦存在指标漏洞,例如,巴黎奥运游泳馆通过碳抵消完成认证,实质碳排放反增 17%。这些现象折射出当前全球体育治理仍局限于技术修补与功利计算,缺乏源于文明内核的价值引领。因此,积极实践“天人合一”的永续发展观,不仅关乎体育治理的技术路径,更是文明层面的觉醒,该思想将全球体育治理从技术操作层面提升至文明对话维度——正如张载所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唯有将体育重新锚定在天地人的宏大系统中,方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 1.3 体育生态:全球体育生态系统的思想诞生

由于现代体育与社会生活各层面关联度的日益加深,现代体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多样化,生态学不断发展和生态观念的拓展,体育与生态的联系逐渐被人们认识和重视,以生态观念观照体育,把握体育规律,促进体育发展就成为一种必然。自 20 世纪末以来,体育界一些学者逐渐将生态学概念引入体育研究,提出很有价值的见解。体育融合于生态中,二者既互相依存又对立统一,且均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应加强对体育生态的研究,改变我国体育生态研究较为滞后的现状<sup>[7]</sup>。体育生态离不开体育生态文明观的指导,而体育生态文明观建设必须树立生态哲学的世界观,以生态伦理学理论为方法、生态道德为途径,实现体育的可持续发展<sup>[8]</sup>。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绿色奥运理念的提出和实践为体育生态学的诞生提供了鲜活的经验指导。绿色奥运是一种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生态奥运,是一种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动力、行为、生机和文化,利用和谐的生态服务功能、资源节约型的高新科技,以及“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作为支撑,最终实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生态奥运”<sup>[9]</sup>。基于体育生态,有学者提出“体育生态化发展”的概念,以人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科学化统筹与伦理化协调的方式,实现体育内部和外部系统的优化平衡与协同发展<sup>[10]</sup>。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人文关怀”的优势和“崇尚人与自然和谐、追求天人合一、主张顺应自然”的品格为体育生态注入新的精神内涵,推动全球体育向着“多元共存、互相

吸纳、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sup>[11]</sup>。以上表述从各角度提出了一些体育生态理论,并从不同层面加以论述,可视为体育生态学的萌芽或诞生。然而,直到今天体育生态的理论研究仍发展缓慢,远远落后于实践发展。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体育治理中存在绝对文化话语权,在制度设计方面存在文化盲视,奥林匹克议程设定的“团结”愿景缺乏真正的跨文明对话机制,陷入“程序正义掩盖文化霸权”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体育生态为全球体育健康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未来应更多关注人文关怀,追求和谐共生,将多元文化包容性纳入奥运改革评估体系。

## 2 全球体育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破解思路

### 2.1 现实困境:全球体育治理乱象丛生

全球体育治理指全球范围内,社会公私合作处理体育公共事务的过程。当前全球体育治理围绕国际奥委会为核心,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各洲体育运动联合会、各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体育仲裁法庭等 5 个主要利益组织为治理主体,通过合作、参与、谈判和协调的方式,以“善治”作为权力运作的标准,谋求实现体育领域共同利益的过程<sup>[12]</sup>。但在实践中,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社会活动,全球体育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全球体育“治理失灵”。治理是指各类主体“在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设计及制度安排之下管理共同事务的不同行为方式总和”<sup>[13]</sup>,体现在共同参与一个复杂的多元协同、动态发展、博弈互动的过程中。全球体育治理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兼具行政型、市场型与自愿型属性的公共治理,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在合作共治基础上,共同推进全球体育健康发展,并促进其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研究认为,当前解决全球体育“治理失灵”问题,构建健康的全球体育治理体系,至少面临如下现实挑战。

一是全球体育治理格局失衡。当前,全球体育治理参与主体变得逐渐多元化,国际体育组织不再是全球体育秩序的唯一主导者,联合国、欧盟、欧洲委员会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也在全球体育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金砖国家体育合作组织、海湾国家体育委员会、东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等多个新型国际体育机构相继建立。尽管全球体育治理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深层矛盾仍有待解决。一方面,国际体育组织仍是全球体育秩序的主要制定者和领导者,虽其独立于主权国家政府之外,具有独立性、跨国性、非营利性特征,但仍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操纵,欧美发达国家掌握绝对话语权,发展中

国家只是理论上的全球体育治理主体之一,其建议方案很少能够被采纳,特别是平等性利益诉求很难被实质性满足;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奉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如美国借以人权、民主为由对其他国家体育活动进行外交抵制。如果上述治理方式长期存在,极有可能导致全球体育治理行为偏离“通过体育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一国际奥委会的终极愿景,体育治理多元主体的功能和作用可能会被削弱,甚至消失,届时全球体育发展的活力也恐将面临“无源之水”的境地。这种格局失衡,恰恰说明将全球体育视为一个由少数核心机构控制的“机械系统”已然失效。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强调生物多样性,其稳定性依赖于多种群在各自生态位上的共生。因此,必须构建一个去中心化、多元共治的全球体育生态系统,让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明背景的主体都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成为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被边缘化的对象。

二是全球体育治理机制僵化。全球体育治理机制是指全球体育治理主体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对外部环境中各种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变动的反应方式,以及不同主体行为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方式。这种治理机制必须通过单边、双边、多边或者区域的方式构建,并在高水平合作基础上实现高质量互惠共赢。但是反观当下全球体育的治理机制,仍是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旧机制,国际体育组织实行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组织结构相对封闭固化,排斥外部力量的干预和监管,已无法代表全球体育治理的规范制度。以国际奥委会为例,90%国际体育组织总部分布在欧洲,负责人60%以上来自于欧美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偏少。历届9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全部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现任115名国际奥委会成员中,仅有40位来自亚洲和非洲,但欧洲一个地区的委员数就已达45人。由于国际体育组织治理机制不顺畅,导致自治与善治的矛盾日益加剧,治理结构脆弱,对全球体育治理掌控力出现下滑的趋势<sup>[14]</sup>。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维护其在现代体育领域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利用其占主导地位的全球体育组织对体育界进行嵌入,在后发国家的思想中灌输特定价值范式,以此促使相关群体进行自我限制,从而适应西方主导的全球体育发展诉求。国际体育组织自治缺陷,以及治理规则和行为规范制定的滞后性,使得全球体育治理体系进入一种“治理失序”状态。全球体育治理机制不完善,保障和协调不顺,治理目标和行为发生偏离与异化,必然会导致沟通协调成本上升,阻碍全球体育治理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实现<sup>[15]</sup>。僵化的机制无法应对复杂系统的动态变化,生

态系统的成功在于其自适应能力,即系统内部要素能根据环境反馈自我调整。这要求全球体育治理机制必须从僵化封闭转向弹性开放,形成能够及时响应新问题、学习新知识、容纳新规则的适应性制度安排,这正是生态系统构建的核心要义。

三是全球体育治理效能不彰。实践中,全球体育腐败、兴奋剂、操控比赛等传统性问题尚未填补,可持续、数字化、气候、难民等新课题又层出不穷。首先,全球体育治理结构呈现出科层制结构样态,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等全球体育治理主体在决策与资本吸纳上缺乏透明度,导致其腐败问题层出,出现信任赤字,公信力的缺失使得国际体育组织长久以来深陷“塔西佗陷阱”。2016年7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指出俄罗斯“有组织的集体服用兴奋剂”并操纵药检结果,使俄罗斯陷入兴奋剂丑闻,受到里约奥运会禁赛的严厉处罚。同年9月,俄罗斯黑客“奇幻熊”入侵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数据库,披露出众多合法取得治疗性用药豁免权的美欧知名运动员名单<sup>[16]</sup>,而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其作为核心主体在自治框架内相对封闭地协调全球体育事务,引发了许多主权国家的不满。其次,由于人类体育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影响了生态环境和体育可持续发展,且这些影响超越了体育的范畴。以大型体育赛事为例,从赛事筹备期间开始,就需要占用土地资源修建大型体育场馆及附带生活设施,且在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噪音、废气、粉尘、废水以及剩余废物料等二次污染;延至举办期间,举办城市短时间内涌入大量观众、运动员、媒体从业者、教练员、裁判员和志愿工作者,其吃穿住行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给城市资源造成负担。最后,全球体育信息化管理水平整体较低,制约了现有治理体系的效率提升。反观当前形势,自从人类社会迈入网络社会以后,各类主体和要素之间逐渐联成网络关系结构<sup>[17]</sup>,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新兴技术推动了行为性或组织性层面的变革与创新,有利于创新治理方式、提高治理效能,但是对全球体育治理而言,如何利用大数据智能化技术提升治理的专业化水准、科学化水平和理性化程度,仍任重而道远。效能不彰源于治理模式的“碎片化”,各主体、各环节未能形成合力,生态系统强调整体性与协同效应。构建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旨在通过建立信息共享、资源互补、行动协同的网络化结构,将多元主体的力量整合为有机的整体功能,从而显著提升应对复杂挑战的效能与效率。

四是全球体育治理秩序失序。纵观全球体育治理相关政策发展史,发现当前治理制度主要在《联合国

宪章》和《奥林匹克宪章》框架下制定,其主体内容形成时间较早,且均在西方国家主导下设计,难以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虽经多次修订,仍难以满足当前全球体育治理的新形势、新需求。以兴奋剂治理问题为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于2003年颁布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但是该条例未明确规定使用兴奋剂行为的人刑标准、刑罚力度、犯罪主体范围等,导致不少国家在反兴奋剂问题上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英国等对“兴奋剂入刑”持否定态度,而西班牙等国明确规定“兴奋剂入刑”。全球体育治理制度是解决全球体育问题、维护全球体育秩序的跨国性规范、条例、标准、协议等,然而,当前全球体育治理的发展方式和路径依然不甚明确。至此,从宏观层面看全球体育治理体系虽已有相应布局,但主要是西方世界价值观的体现,缺乏代表性和包容性,压制多元体育文明表达,未能反映全球治理的新格局。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共设置28个大项和306个奖牌争夺项目,除柔道和空手道外,其余所有项目均发源自西方<sup>[18]</sup>,非奥项目面临国际传播困境。秩序失序的根源在于价值共识的缺失,生态系统的平衡建立在多样性统一的基础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基石构建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正是要培育一种包容互鉴、和而不同的“系统文化”,在此框架下形成既能维护基本秩序、又能尊重多样性的规则体系,实现真正的“善治”。

当前全球体育治理在格局、机制、效能和秩序层面的困境,共同揭示了根本性问题,即建立在控制、命令与单一文化霸权基础上的传统治理范式已难以为继。这些困境从反面清晰地论证了,必须将全球体育视为一个复杂的、开放的生态系统,并通过构建一种强调多元共治、自适应、协同增效和包容发展的新范式来寻求根本性破解。

## 2.2 破解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构建

作为一种全人类美好向往的生活哲学,体育所体现的和平价值、发展价值、公平价值、公正价值、民主价值和自由价值符合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sup>[19]</sup>,这就决定了全球体育生态系统必定是一个旨在统合整个社会,能够发挥体育功能、治理功能的一切力量的系统,是一种横跨体育领域和行政领域的社会生态子系统、复杂适应系统。因此,对全球体育进行治理便自然不能简单地采取与体育治理、政府治理或社会治理相同的模式。就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理论观点而言,系统自组织性主张多元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系统自适应性强调生态系统的状态转变及稳态维持,系统的韧性管理则旨在探索合理的组织结构以建立个体行为与整

体行为相协调的运作规则,这正是复杂社会背景下全球体育治理需要着力考虑的问题,应该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的逻辑,将源于社会系统的治理思想与源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研究相结合,探寻全球体育治理的变革与优化之道。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制度的变迁与重构等衍生出了对全球体育的新需求,进而改变了既有全球体育格局,推动着全球体育治理的转型与创新。体育既具有社会系统功能高度分化的复杂性,也具有体育系统本身和环境的复杂性,还具有作为双重属性的社会子系统所应有的特定环境复杂性,更因此而呈现出动态性、多样性、非线性、整体性、不确定性、自组织性等,所以可将全球体育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从社会生态视角看,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元、立体、开放、灵活并覆盖在各种生活领域的网状系统,它本身是一个处在动态变化过程的社会生态系统,其参与主体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适应性进化,当某些重大的问题出现时,必然促成全球体育在演化过程中的结构调整、秩序重组,甚至造成系统结构差序扩展和秩序失态,这需要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有一个自稳定机制保证系统能够突变到新的结构和功能的有序状态,实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sup>[20]</sup>。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将全球体育回归到复杂社会生态系统范畴,在多层级系统、多元化主体、多类型要素等间构建适应性协作机制,在内外部共生演进中建构推进全球体育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特定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该系统的构建并非从零开始,而是对现有全球体育要素进行生态化重组与优化,其核心框架包含以下3个层次(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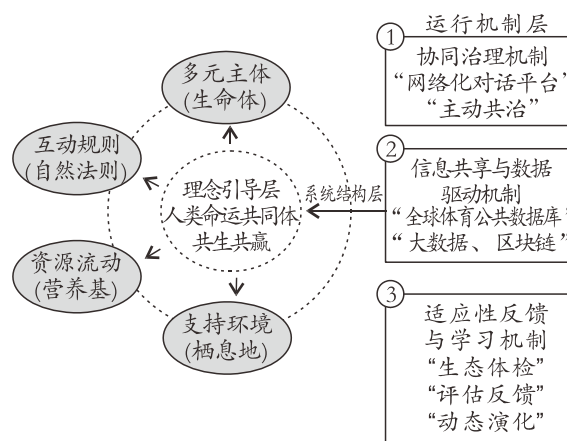


图1 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构建框架

一是确立共生共赢的理念引导层。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依赖于共享的价值观念,理念引导层是生态系统的价值基石。全球体育生态系统的构建,首先需要超越零和博弈与霸权逻辑,植入共生共赢的生态哲学。这恰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该理念强调各国命运紧密相连,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提供顶层价值指引。在此理念下,全球体育发展的目标应从单一主体利益最大化转向整个系统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确保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能在体育生态中找到自身的生态位,实现和谐共处与共同繁荣。

二是明晰四位一体的系统结构层。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其稳定运行依赖于四大核心构成的相互支撑与动态平衡,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构成。具体而言,该系统由4部分有机构成。第一部分为多元主体,这是系统的生命体。包括国际体育组织、主权国家及其体育机构、跨国公司、媒体、非政府组织、运动员、专家学者及公众等。它们不再是简单的管理客体,而是具有自身利益、资源和适应能力的能动者,共同构成生态系统的种群网络。第二部分为互动规则,这是调节系统运行的自然法则。既包括《奥林匹克宪章》等正式制度,也包括体育精神、公平竞赛等非正式规范,以及通过协商形成的各种协议与标准。生态系统的生态规则应强调弹性、包容性与适应性,能够随环境变化而演进。第三部分是资源流动,这是系统的营养基。包括资金、技术、数据、人才、场馆设施等。构建生态系统的关键之一是打破资源壁垒,促进各要素在系统内高效、公平地流动与循环,如同自然界的能量流动循环,滋养系统的每一个部分。第四部分是支持环境,这是系统存在的宏观背景。包括全球政治格局、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变革、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系统的构建必须考虑与这些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互动,让其成为成为多元主体的栖息地。

三是构建协同适应的运行机制层。为使上述结构焕发生机,需要建立一套能够激发系统自组织、自适应能力的核心机制作为生态系统的动力机制。当前信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气势强烈冲击着传统经济社会系统。它们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外部约束和推动力作用于全球体育,使其更加多元化、异质化、动态化。因此,应构建适应“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技术逻辑和时代特征的全球体育治理模式。首先,建立协同治理机制,通过建立多层次、网络化的对话与决策平台,如基于数字技术的全球体育治理云论坛等,促进多元主体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共治,形成既相互制约又协同

增效的治理合力。其次,建立信息共享与数据驱动机制,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构建全球体育公共数据库,提升资源流动与规则执行的透明度、可追溯性,为系统适应性调整提供精准依据。最后,建立适应性反馈与学习机制,建立系统性的评估与反馈回路,定期对全球体育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如公平性、可持续性、包容性等进行生态体检,使系统能够从内部矛盾和外部挑战中学习,实现其动态演化与持续优化。

综上所述,全球体育生态系统的构建,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灵魂,对系统主体、规则、资源与环境进行结构性整合,并通过协同、数据驱动与学习机制赋予其动态生命力的过程。后续的“治理”实践,正是旨在维护和优化这一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活力。

### 3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治理的新理念与新实践

#### 3.1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治理的中国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为重构全球体育治理秩序提供了重要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体育工作,围绕新时代体育事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这也为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治理提供了丰富的中国理念。中国理念之所以构成“新理念”,在于其植根于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哲学传统,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零和博弈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将体育视为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公共产品,而非政治博弈的工具。习近平关于“体育强则中国强”“奥运精神是团结和友谊的象征”等重要论述,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价值观,更在全球化语境下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一理念的“新”,体现在其价值导向的根本转变——从竞争主导转向共生导向,从单一文明优越转向多元文明互鉴,从而为全球体育治理提供新的哲学基础。

自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一新中国体育发展的方针后,中国体育的发展历程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主题,逐步体现出人民主体地位的实践特色。习近平希望运动员获得更好成绩,但“成绩不仅仅在于能否拿到或拿到多少块奖牌,更在于体现奥林匹克精神,自强不息,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只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即使没有拿到奖牌,同样值得尊敬和赞美。2017年访问瑞士期间,习近平提出“弘扬奥运精神,促进和平发展”,表

达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也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sup>[21]</sup>。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欢迎宴会上,习近平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顺应时代潮流,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22]</sup>2024年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提出“奥运会是团结和友谊的象征,是文明互鉴的结晶”。这不仅传递着对不同文明的尊重,也道出了相互理解、友谊、团结等奥林匹克精神的真谛,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生的理念。

“人类的一切文明成就都值得全人类共同欣赏和分享”,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传递着对其他文明的平等尊重,也道出相互理解、友谊、团结等奥林匹克精神的真谛,是习近平体育思想在全球体育治理领域中表达与传播方式的呈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进行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治理提供了新的理念指引。但鉴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演进与现实发展的特征、习近平体育思想的内涵要义和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治理的中国路径建构的现实之扰,要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治理的中国理念,既要立足中国体育治理的理念,亦要关注当代世界体育发展的“共有特征”。只有以融入全球体育的广阔胸怀,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的治理理念,才能构建出与国际接轨的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治理的中国路径。

### 3.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治理的中国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体育事业发展迅速。为改变被动型与反应型的国际秩序参与局面,逐步扩大在全球体育事务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40多年中,从起初向发达国家借鉴学习体育治理经验、积极参与全球体育治理,到现在提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构建全球体育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不断以一种渐进的、非对抗性的方式融入并完善现存国际秩序,贡献全球体育治理合作与发展的中国实践。中国实践之所以构成“新实践”,在于其实践路径的系统性、技术赋能的前沿性以及全球体育治理范式的重构性。以北京冬奥会为例,不仅是理念层面的创新,更通过闭环管理、低碳技术、赛后遗产转化等具体机制的落地,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这种以系统性工程思维推动体育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超越了西方传统体育治理中“重赛事、轻遗产”“重竞技、轻参与”的局限,体现了中国实践的整体性与可持续性。

一是以共同体理念引领系统价值,重塑治理目标。北京冬奥会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其核心就是追求系统整体价值最大化,而非单

一赛事的短期利益。北京冬奥会成功抵制体育政治化倾向,“一起向未来”的口号深刻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将赛事成功定义为促进团结、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公共产品,促进体育非政治化与团结协作全球共识的达成,彰显了奥林匹克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度融合。举办期间,多国政要与学者明确反对将奥运会政治化,反对政治操弄,强调体育应成为“跨越意识形态的桥梁”,如土耳其和埃及奥委会指出“冷战思维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精神”<sup>[23]</sup>。通过冬奥会“一起向未来”口号和91国运动员的互动,构建了超越国界的文化对话场域,建立了团结实践的平台。在中国,冬奥会已成功“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在世界,它对冰雪运动和相关产业发展持续释放积极推动的力量。例如,黎巴嫩代表团唯一一位女性运动员欧维斯则希望“通过她在冬奥赛场上展现出的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带动更多黎巴嫩人关注 and 热爱冰雪运动”,沙特运动员阿卜迪受冬奥会激励回国成立冰雪培训中心,推动了冰雪运动全球化。此外,北京冬奥会积极吸纳跨国公司、原住民社群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赛事筹办,实施包容性治理,体现共建共享理念,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容性准则。这实践了生态系统治理的共生性理念,将治理目标从竞争导向转向共生导向。

二是构建网络化协同体系,优化治理结构。冬奥会期间建立的赛时运行指挥体系,有效整合了国际奥委会、各国代表团、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多元主体,形成跨地域、跨层级的高效协同网络,实现统一领导与多方协作的范式突破。北京冬奥组委联合国际奥委会、世卫组织等成立国际疫情防控专班,并通过防疫联络官机制实现政策精准落地,通过建立统一领导机制,确保闭环管理成功运行。同时,赛事筹备整合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构建多方协作网络,如国际冰雪运动博览会通过全球资源整合推动冰雪产业升级,体现“赛事—产业—文化”生态化治理理念<sup>[24]</sup>。打破过去传统的垂直命令体系,建立具有生态系统特征的网络化治理结构,体现了治理主体的网络性,确保了系统在面临巨大复杂性时的稳定运行。

三是运用适应性管理应对不确定性,创新治理过程。在面对新冠疫情这一巨大外部冲击时,北京冬奥会并未简单照搬过往模式,而是制定疫情防控与应急保障的系统性方案,构建科学动态的防疫体系,保障赛事零聚集性感染,被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赞为“安全舒适”的典范。同时,实行应急联动机制,提升危机应对能力,建立五省联动的交通保障网络,储备应急物资1.8万吨,并通过“赛时一天”综合演练实现

98%问题在场馆层面即时解决,强化了跨区域协同能力;部署科技应急装备,采用无人机消杀、直升机救援等技术,实现运动员转运救治最快仅需5分钟,极大提升了赛事安全保障水平。北京冬奥会创造性地实施了闭环管理系统,形成一套可复制的危机管理模型。该系统基于科学评估,根据实时反馈进行精准调整,最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成功举办赛事,是一个典型的适应性治理过程,充分证明生态系统治理应对复杂风险的适应能力。

四是通过技术赋能与遗产转化,强化治理手段。北京冬奥会广泛应用数字化、低碳技术,通过低碳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不仅提升了赛事运营效率,更将这些技术方案转化为可推广的公共产品,为全球体育赛事树立了可持续发展典范。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零碳冬奥目标,通过二氧化碳跨临界制冰技术、可再生能源供电等,使碳排放量趋近于零。同时,重视赛后持续利用,努力打造场馆遗产新优势。作为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北京最大限度地高效使用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遗产,包括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开闭幕式,将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转变为“冰立方”、五棵松体育中心篮球馆变成冰球馆,还有在张家口崇礼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也已经是建成近10年的成熟滑雪场,避免白象工程,并通过绿色办奥,留下丰厚的绿色遗产。北京冬奥会低碳方案被国际学者评价为“全面推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典范”,是一场碳中和的绿色革命,实现了中国经验的国际标准输出。同时,通过“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遗产战略,将赛事能量转化为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动能,凸显了治理手段的赋能性,通过技术赋能和遗产创造,增强整个国家乃至更广范围内体育生态系统的活力。

北京冬奥会展示了我国体育治理的最新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体育治理提供了重要经验,深刻改变了世界冬季运动格局,开启全球冰雪运动新时代,推动构建全球体育治理新秩序,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治理中国经验的魅力,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实践场域。

#### 4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治理的中国路径

全球体育治理体系的深层困境,如格局失衡、机制僵化、效能不彰与秩序失序,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建立于工业时代、以西方中心主义和线性控制思维为主导的传统治理范式,已无法适应数字化时代全球体育作为一个复杂社会生态系统的内在要求。因此,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导航,系统构建一套

既能根治沉疴、又能引领未来发展的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治理的中国路径。

**4.1 理念重塑:以共同体价值引领系统治理哲学的革命**  
全球体育治理的秩序失序,根源在于价值共识的缺失与文明对话的不足。西方主导的治理体系往往隐含零和博弈与文明优越论的逻辑,导致规则制定难以包容多元体育文明,进而引发合法性危机。破解此困境,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治理哲学的深刻革命,确立新的系统价值基石。

一是实现从零和博弈到共生共赢的价值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提供了顶层的价值罗盘。它深刻揭示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一国的体育发展无法脱离全球体育的健康生态而独善其身。这与生态学中共生理论高度契合。中国路径强调,全球体育治理的根本目标,应从追求单一国家或组织利益的最大化,转向维护和提升整个全球体育生态系统的健康度、韧性与可持续性。这意味着,治理的成功标准不再是己方收益多少,而是系统能否实现多元主体的和谐共处、体育资源的公平流动以及应对全球性风险的协同能力。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来”的口号及其反对体育政治化的成功实践,正是将共生共赢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的典范,证明了体育可以成为跨越分歧的团结纽带。

二是植入和而不同的文明对话机制。理念重塑不能止于口号,必须转化为具体的议程设置与规则嵌入。中国应积极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多元平台,将“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东方哲学智慧纳入全球体育治理的讨论框架。例如,在《奥林匹克议程》的评估体系中,增设文化包容性指标,衡量奥运项目设置、仪式安排、遗产规划中对非西方体育文明的尊重与吸纳程度。在反兴奋剂、赛事可持续性等具体领域,应倡导建立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规则体系,承认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在治理能力上的差异,并提供相应的技术与资金支持,而非“一刀切”的强制性标准。

通过这种持续的理念传播与制度性嵌入,逐步培育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全球体育系统文化,为治理秩序的重构奠定最广泛的价值共识。

**4.2 结构重组:构建多中心、网络化的协同治理生态**  
治理格局的失衡与机制的僵化,源于当前治理结构的单极中心化与层级封闭性。将全球体育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就意味着必须对其进行结构重组,重组过程中聚焦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组织形态的网络化,将治理结构从金字塔式的科层制,转向多中心、网络化的协同治理生态。

一是从精英俱乐部到多元共生体,实现主体扩容。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全球体育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也取决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代表性。中国路径的核心举措之一为系统性推动治理主体的扩容与赋能:一方面,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话语权,可联合其他新兴经济体,共同推动在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等核心组织中增强执委、专业委员会等职务构成的包容性,推动建立更具区域平衡性的职务安排机制;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在国际体育事务中发挥更积极作用,鼓励其优秀人才参与国际体育组织工作。另一方面,激活非国家行为体的治理功能,明确认可跨国公司、媒体机构、顶尖运动员联盟、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学术智库等作为正式治理伙伴的地位,通过丰富治理主体的构成,将专业资源与创新活力引入治理网络,重塑全球体育治理的权力结构与运作逻辑。

二是打造平台型协同治理接口,强化主体联结。多元主体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需要通过协同治理实现有机整合。北京冬奥会赛时运行指挥体系的成功,在于构建了一个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接口。中国应倡议将这一经验升华为常设性的全球体育治理协同平台。例如,构建数字驱动的协商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去中心化的全球体育治理云论坛,确保各国奥委会、国际联合会、运动员代表、商业伙伴等能够进行安全、透明、可追溯的提案与表决,重大决策前,需在该平台进行公开咨询和影响评估,实现多元主体的实时互动与共识形成。同时,建立议题导向的联盟机制,针对电子竞技入奥、气候友好型赛事标准等特定问题,鼓励形成灵活性议题联盟,由最相关的利益方主导谈判和规则制定,避免在庞大臃肿的全体会议中陷入僵局。这种模块化治理方式,正是生态系统应对复杂性的典型策略。

通过上述结构重组,全球体育治理将从一个由少数机构控制的机械系统,转变为一个各类主体在各自生态位上发挥功能、既相互竞争又彼此依赖的有机生态系统。

#### 4.3 过程重构:实施数据驱动与适应性治理的闭环管理

治理效能不彰,往往源于治理过程的碎片化与静态化。生态系统强调整体性与动态演化,因此,对全球体育生态系统进行过程重构必须着眼于治理流程的智能化与动态优化,形成“监测—评估—学习—调整”的连续性闭环,灵活应对不确定性。

一是构建全球体育大脑,实现全流程数据驱动。数据是生态系统的神经信号,应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构建全球体育大脑,为治理决策提供实时、精准的支持。一方面,建立一体化数据基

础设施,倡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国际奥委会牵头,制定全球体育数据标准与共享协议,整合赛事运营、运动员健康、商业赞助、媒体传播、环境影响等多源数据,形成全球体育公共数据库,有效破解当前因信息孤岛导致的信息不透明和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开发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基于上述数据,开发系列算法模型,如兴奋剂风险预测模型,通过分析运动员生物护照、旅行轨迹、训练数据等,实现精准防控;设计赛事可持续性仿真模型,在申办阶段即可评估场馆建设、交通规划对当地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优化方案;打造舆情监测与危机预警系统,实时捕捉全球媒体与社交网络对重大体育事件的反应,为公关危机和地缘政治风险提供早期预警。

二是嵌入适应性治理循环,从危机应对到前瞻性适应。北京冬奥会的闭环管理是适应性治理的典范——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方案,而是基于疫情动态进行持续评估和微调的系统工程。中国应推动这种适应性管理理念系统融入治理实践,例如在运动员流动、参赛资格标准等重要运行规范中引入定期评估与动态调整,设定评估周期,到期后组织多方评估以决定其延续、修订或优化。同时,鼓励在区域或特定项目中先行开展试点探索,待模式成熟后再向更大范围推广。

经过程重构,全球体育治理将从被动的、回应性的“灭火队”,转变为主动的、前瞻性的“生态系统园丁”,能够持续学习并自我优化。

#### 4.4 制度调适:推动包容性与适应性的制度创新

现行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形成于旧时代,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代表性缺失与适应性滞后问题。中国路径的最终落脚点,是通过参与共商共建共享的制度创新,为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提供坚实、包容的制度保障。

一是增强制度的公平性与代表性。推动规则制定程序民主化,主张在修订《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奥林匹克宪章》等核心规则时,采用协商一致与超级多数决相结合的方式,既要尊重广泛共识,也要防止少数国家滥用否决权。确保草案起草小组的成员构成具有地域和文明的代表性。同时,可以发起“非奥项目振兴计划”,针对奥运项目设置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可联合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倡议建立“世界传统体育与新兴运动联合会”,系统整理和推广武术、卡巴迪、藤球等非西方起源的体育项目,并为其设立世界锦标赛体系,逐步为其进入奥运大家庭创造条件,丰富全球体育的文化多样性。

二是提升制度的弹性与执行力。一方面,创新软法与硬法相结合的混合规制模式,对于气候变化、人权保障等新兴议题,可先通过发布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的最佳实践指南,鼓励各方自愿采纳并积累经验。待条件成熟后,再将其核心内容上升为强制性标准,这种渐进式策略有助于在共识不足时推动改革。另一方面,强化制度执行的支持体系,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可通过设立全球体育治理能力建设基金,重点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反兴奋剂检测、赛事管理水平。同时,推动建立国际体育技术援助团,选派中国在场馆建设、赛事组织、数字技术等方面的专家,为其他国家的重大体育项目提供咨询,将中国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从根本上弥合治理能力的鸿沟。

全球体育生态系统治理的中国路径,是一条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魂”,以多元共治的网络化结构为“骨”,以数据驱动与适应性治理过程为“筋”,以包容有效的制度体系为“肉”的有机整体。该路径表明,中国的贡献并非意在取代现有体系,而是通过注入新的哲学理念、引入新的治理技术、构建新的合作模式,来催化现有体系的生态化转型。在全球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培育一个更具包容性、韧性和生命力的全球体育生态系统,使体育真正成为促进人类团结、文明互鉴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力量。

### 参考文献:

- [1] 鲍明晓. 贯彻《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办好人民满意的体育事业[J]. 体育科学, 2019, 39(9): 3-13+23.
- [2] 白银龙,舒盛芳. 中国参与全球体育治理:历史脉络、演进特征与未来展望[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0(3): 108-114+136.
- [3] OSTROM E.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Science, 2009, 325(5939): 419-422.
- [4] HOLLAND J H. Complexit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0.
- [5] 习近平.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 奋斗, 2019, 62(3): 1-16.
- [6] 宋灵,卫才胜. 中华体育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 42(10): 50-52.
- [7] 谢雪峰. 体育生态研究的哲学前提[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5, 28(12): 1585-1588.
- [8] 邓跃宁,李峰. 论体育生态文明[J]. 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 2007, 27(1): 5-7.
- [9] 王如松,王丰年. 北京绿色奥运的生态学研究[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16(2): 68-71+94.
- [10] 陈淑奇. 当代中国体育生态化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探析[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8(5): 47-50.
- [11] 王洪坤. 中国体育文化生态的历史演变论绎[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7, 41(1): 1-6.
- [12] 王莉,阚军常. 参与全球体育治理,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基于主场外交视角[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0, 36(2): 10-17.
- [13] 张培. 社会治理创新视阈下社区教育发展研究[J]. 成人教育, 2016, 36(9): 14-18.
- [14] 任慧涛,郑志强. 全球体育可持续发展战略整合、协同推进和中国参与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1, 44(8): 32-41.
- [15] BAADE R A, MATHESON V A. Going for the gold: The economics of the Olymp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6, 30(2): 201-18.
- [16] 邢婉莹,王大鹏,张世杰,等. 政治博弈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公信力的流失与重塑[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9, 42(3): 80-87+156.
- [17] 何明升. 技术与治理:中国70年社会转型之网络化逻辑[J]. 探索与争鸣, 2019, 35(12): 41-52.
- [18] OTAMENDI F J, DONCEL L M, MARTÍN - GUTIÉRREZ C. Meeting expectations at the 2016 rio olympic games: Country potential and competitiveness[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20, 101(2): 656-677.
- [19] 易剑东.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世界体育的价值取向——纪念顾拜旦诞生160周年[J]. 青少年体育, 2022, 11(12): 26-29.
- [20] 范冬萍. 复杂性科学视角下的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分析[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9, 41(10): 77-82.
- [21] 付求勇.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体育学刊, 2022, 29(4): 1-7.
- [22] 习近平.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欢迎宴会上的致辞[N]. 人民日报, 2022-02-06(02).
- [23] 新华网. 消除体育政治化杂音 促进人类团结友爱——北京冬奥盛会获多国人士好评[EB/OL]. (2022-02-12)[2025-02-28]. [http://www.news.cn/world/2022-02/12/c\\_1128361690.htm](http://www.news.cn/world/2022-02/12/c_1128361690.htm)
- [24] 赵静. 北京冬奥会为世界交出一份丰厚遗产[EB/OL]. (2022-02-22)[2025-02-28].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2/0222/c1003-32357232.htm>